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

REAL CHINAMAN



真正的中国佬

【首译本】

(美) 何天爵 著

鞠方安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

REAL CHINAMAN

真正的中国佬

【首译本】

(美) 何天爵 著

鞠方安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正的中国佬: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美)何天爵著;鞠方安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8.

ISBN7-80145-036-1

I. 真… II. ①何…②鞠… III. 民族精神—研究—中国
IV. C9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2881 号

据美国野鹅出版社 1895 年版译

真正的中国佬

〔美〕何天爵 著

鞠方安 译

责任编辑:徐 晓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号码:63017788·22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施园印刷厂印刷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199 千字

印数:00,001—10,000 册

定价:15.80 元

序 言

戴逸

中国被西方所认识并纪之以书，大抵应从《马可·波罗游记》算起；其后的利玛窦更以“西儒”之身份撰写了多种著作，力图在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之间寻找结合点。在这些著作的影响下，十八世纪的欧洲汉学界充满了对中国社会理想化的描述；与此同时，欧洲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和亚当·斯密亦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华夏这个古老的文明。有的赞美这一古老文化，以为可成西方的借鉴；有的则鄙视中国，揭示其停滞不前的传统原因。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中国观”逐渐得以形成。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在席卷世界的近代化浪潮中被抛在了后面。于是，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时代由此开始。

结束这样一段痛史，迄今已近半个世纪，今世的人们对于那一时代的认识，往往仅限于教科书和一些演义化的影视文艺，而缺少更生动更真实更细致的资料作为参考。事实上，随着当年舰炮而进入中国的，还有大批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家等等。这些人在中国居留甚久，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有着不同程度的了解，当然

也有着迥异于国人的视角。他们通过自己的多方观察和体验，分别写出过许多有关中国社会各个侧面的专著，对西方人认识中国产生过巨大作用。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著述一直湮埋于历史的烟尘之中；我们只能从鲁迅、潘光旦等老一辈学人的引用、赞叹和批评里，隐约遥想这些著作当年的影响。

现在，一批青年学人本着重新认识和借鉴西方“中国观”，借以追溯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冲突的历史，以便更清晰地了解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这一目的，从库藏旧版中译出这套丛书，命之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这实在是一件深具意义的事。这些原著或成书于十九世纪末，真实地记录了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各层面的状况，并附有大量珍贵的旧照片；或撰写于二十世纪初中期，由近及远地透视出了西方人对中国社会认识轨迹的变化。总体来看，这些作者对中国还是较有感情的；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方面也确有贡献。具体而言，有些早期作者在中国的居留岁月里，也提出过一些友好和善意的建议，比如主张戒除鸦片，反对缠足，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以及提倡改革教育制度等；另有一些著者则秉承学者的良知，比较真实地记录和分析了西方“中国观”的形成脉络和变化形态。

毋庸讳言，由于文化隔膜及未能深入准确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书中难免存有一定的偏见和错觉。因此，某些仅凭粗浅的认识即信口开河妄作解人的观点，多少便带有自大张狂和民族歧视的痕迹。至于这样一些故意夸大他国族性弊端的微词非议，或者有目的地宣扬宗教思想的传教士腔调，只能昭显出作者的狭隘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一个雄据于东方，充满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已经丝毫无损，我们已有足够的度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

出版编辑这样一套译丛，有选择地引进介绍一批在西方社会影响巨大的有关“中国观”的经典著作，我以为还有另一层意义，

那就是有利于促进国内近代文化史、社会史及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对于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范围和深度也将起重要作用。再者,书中也存有许多善意的批评和中肯的建议,即使百年之后来回顾这些意见,仍具有一定的警醒价值。如果能积累有年,持续不断地编译下去,将是一项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出版工程。我希望这套译丛能够多出一些,出全一些,不企望一次性完成;同时在著作的选择方面下大功夫,争取能集萃最具经典性的作品。从中我们可以审视历史,温故而知新,最终达到提高我们民族素质的目的,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警示的那样:“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主编前言

黄兴涛 杨念群

十多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着意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步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它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知识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温馨的记忆。那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至今,我们仍然期待着它能够有新的延续。

但是,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当中国人远度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飘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及其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中国人民性格等方面之形形色色的记录、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从中华民族的

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在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内容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在那中国人倍受欺压的岁月,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它们的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政府所雇的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外国在华报刊及西方各大报派驻中国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律师和商人,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远非同时期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从而建立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板,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相当一部分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此对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块垒”。在这种情况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就只有文化传播的意义了。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的对象,都会受到历史的和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

且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连西方学者自己也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地变化着（见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著《中国变色龙》）。19世纪中叶以后至20世纪前半，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美妙，令中国人揽镜自照之下，爽心悦目之感油然而生，而是观之不免既惭且愤，由此生奋发图强、赶超雪耻之念。如今，中国人的“汉唐气魄”正在逐渐恢复，坦承这种形象变化乃是西方认识中国逐渐深化的表现，或至少是其认识中国走向深化的必经过程，大概不会太显唐突。其实，我们怎样看待它并非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种曾影响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响着这一交往的历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是不会不正视它，不研究它的。

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好比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一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无疑将有助于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现代化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目前，国内学术界比较重视对西方汉学专门研究成果的译述。其中，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外汉学丛书》，是较有影响的两种。它们向国人介绍了不少当代西方和日本一流的汉学研究著作，资为国内学者学术研究的借镜。而我们这套丛书，则主要选择19世纪中国国门被打开后，来华西人综合记述中国社会政治制度、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民族性格等既具“宏观性”而又不那么古板学究气的各种著述。我们的选择标准是：它们曾经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对西方人的“中国观”产生过一定影响，作者眼光独具，经历丰富，观察细腻，

议论有味，总之生动可读。与此同时，丛书也包括了一些后来的西方学者对欧美“中国观”予以分析研究的总结性著述。但愿这套丛书对国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和西方人的中国观，能够有所助益。

此套丛书原题“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前四本曾由时事出版社出版。后因种种缘故，现改由光明日报出版社继续推出，特此说明，敬请读者谅解。

1998年春



目 录

序言 · 戴逸/ 1

主编前言 · 黄兴涛 杨念群/ 4

前言/ 1

1. 导言/ 4
 2. 中国人的政府/ 20
 3. 中国的语言/ 36
 4. 中国人的家庭生活/ 54
 5.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71
 6. 中国人的宗教/ 87
 7. 中国人的迷信/ 106
 8. 中国人的辫子/ 126
 9. 中国人的法庭/ 140
 10. 中国的官与民/ 158
 11. 中国的教育和文化/ 175
 12. 中国的礼仪习俗/ 192
 13. 中国商人及其生意经/ 209
-

- 14. 中国的贫困阶层/226
 - 15. 中国的财政金融制度/239
 - 译后记·鞠方安/253
-

前言

芸芸众生与那位偏居茫茫格林群山 (the Green Mountains) 一隅的老太太并无二致。老太太远离街坊邻舍，孤身独处而怡然自乐。在夏日的某一天，有位陌生人来到她的门前，要一杯水喝。当询问陌生人家住何处，对方告诉住在波士顿城时，她吃惊地喊了起来：“天哪！您在那么遥远的地方该有多么孤独！”在她的想象中，波士顿是一片蛮荒之地，只有那风吹雨打的小木屋，才是她的天地和宇宙中心。

就像那位老太太一样，我们总是喜欢用自己建立的一套标准模式去判断要求他人。至于他人正确与否、明智与否，都要看他们是唯我们的马首是瞻，还是与我们背道而驰来作定论；而全然不顾我们的评判尺度和理想模式如何武断专横，如何浅薄狭隘。

对于成千上万中国人那种不假思索、机械地夏来换单、冬到穿棉、或者按照某人的意志在固定的一天大家必须共同更换衣服的做法，我们不仅感到可笑，甚至给以讽刺和挖苦。然而，在美洲和欧洲，也有成千上万最有修养的贵妇人们在那种不近人情的“时尚” (fashion)

的驱使下，盲目模仿和追求奇装异服而无所不至其极。这些贵妇人的做法与中国人的习惯相比较，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有，那么谁的做法更理智一些？在您作出结论之前，请先看一眼那本来自然优雅，现在却被弄得稀奇古怪、丑陋变形的妇女们的轮廓和线条。您也不妨再作以下的考虑：中国人在季节来临的时候按照某人的命令更换服装的做法，与两个大洲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妇女们不顾自己的个人趣味和爱好，却去接受一种也许是发源于巴黎或者是伦敦贫民窟中的怪样服饰的做法，两相对比，到底孰是孰非？

对于他人，我们需要多一些全面的了解，而少一些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评头论足。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反躬自省，以别人看待我们的眼光来审视一下自己，那么情况将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某种更高的境界，也就是说，一个更准确的视角，用一种非世俗的、理想的、标准的人的眼光去评断我们自己和他人，那么情况将不仅是好一些，而是会更好。进一步宽广的视野不仅仅使得我们的判断更加准确合理，而且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深层意义：它将使得人们更加宽容友爱、更加和睦相处，更加认识到作为人的崇高价值。但是，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

批评指责中国人比正确全面地了解他们要简单容易得多。因为东西方彼此接触了解的历史还太短暂，机会太少。我们对中国的知识大多来自于想象和猜测，而不是立足于事实。因此，对于中国人的种种误会和曲解便是很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事情。然而，他们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民族。现实生活比任何神奇的虚构和猜测都要丰富有趣得多，对于中国人也是如此。深深地吸引着那些虔诚的研究者的，不是为一般众人所熟悉的、经过种种笨拙歪曲的讽刺和描绘的中国人，而是他们的真实生活，还有他们那一套沿袭已久、颇具特色而停滞不变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社会习俗。

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辩护，不是为了道歉和忏悔，也不是为了责备和批评，更不是为了高唱赞歌。作者本人曾在中国居住过许多年，几乎与中国各个角落、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过接触，并与他们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本书所试图向读者展示的，便是我就所接触和了解的中国社会所得到的几点心得和体会。在书中，本人着力于描述和解释中国人社会生活中一些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因素，旨在说明，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如此不可思议的一些思维模式和社会习尚，对于他们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本书所依据的，是客观事实而不是主观臆断。总之，本书力图用大视角、粗线条的几笔，描绘出真正的中国人。

安排在本书各个章节中的大量小插曲，目的在于使我们的描述的内容更加富于生活气息、更加生动有趣和易于理解。每个插曲都代表一个真实的故事，毫无粉饰夸张的色彩。如果有必要的话，作者本人可以将每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牵涉其中的人物，都一一列举出来。同样，书中的每幅插图都忠实于所取材对象的本来面貌，除冲洗照片的技术之外，没有经过其他的任何加工和处理。

中国人的许多优秀道德品质和令人钦佩的性格特点与他们的缺陷和不足交互纠缠在一起而相映成趣。这些东西与时代共存，虽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变化非常缓慢。但是，无论何人，当真正全面了解了中国人之后，他一定会确信：这个民族有着光辉的未来，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终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何天爵

1895年1月写于纽约

1

导 言

中国与西方的相互熟悉交往仅仅始于 30 多年以前，而中国承认欧、美各国存在的第一批条约也只签署了 50 几年。然而，那些条约只发挥了某种前期介绍性工作的作用，缺少诸如允许双方寻求和建立彼此之间任何友好关系的具体条款。只要中国口岸向外国开放贸易并允许外国人居住的口岸仍然局限于沿海三四个城市，只要外国人在中华帝国内地的游历被禁止，只要北京的大门向各国外交代表紧紧关闭，只要我们的使团被滞留于军舰上在中国沿海四处漂荡——只要此种情形存在下去，我们西方人就无法了解中国人，而中国人也无法认识我们。

自从 1842 年 8 月 29 日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第一个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一直到 1860 年《天津条约》的订立，外国使节才被批准进驻北京，外国人也才被允许可以在帝国内地自由游历。在此之前，情况一直如上所述。

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的人们面对面地站在了一起，互相审视着对方。先进的、富有侵略进取性的西方人，机警灵敏，满怀渴望。他们在东方遭遇了象征保守的、代表高傲自尊、雍容自若的中国人。进取与保守相碰撞。已跨入蒸汽时代、钢铁时代、电气时代的西方虎视眈眈，直逼尚处孔子时代的东方中国。不妨作这样的想象：如果把一个近代富于进取的西方商人介绍到那位中国圣人面前，让他们彼此认识交往，并让他们各自形成对对方的印象和看法。这里还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那位圣人从根本上就明确地不愿见这位西方商人。这样，读者对东西方最初接触时的情形便会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概念。

绝对没有交往的共同基础，也绝对没有彼此认可的共同的利益支点。确实，我们希望同中国人做生意。清政府小心翼翼地把我们与它的贸易限制在广东——我们被允许唯一可去做生意的地方，以表明它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与我们进行贸易往来。这种贸易正像如下情形：我们接受从牢不可破的雉堞上递下的成捆的生丝和满箱的茶叶，然后把我们的墨西哥银元和英国鸦片用传回的绳子递上去。只要这种极其细微脆弱的交易方式存在，我们的认识就是：这是限制性的，而不是令人满意的鼓励性的贸易规则。

这并不是说中国特别反对与欧美各国建立政治和经贸关系。实际上她只是不希望在任何方面扩大与西方的交往而已。清政府为了防止内地人民对郑成功抗击清军的支持和联系，于顺治 18 年（1661）勒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 30 里到 50 里，并尽烧沿海民居和船只，不准片板入海。清政府以酷刑保证迁海令的执行，堕毁城廓，焚烧房屋什物；越界者无论远近，均立斩。（后禁令渐宽，到康熙 20 年即 1681 年，始完全撤销。——译者注）如果有人漂洋过海，到了国外，回来后他若一不小心稀里糊涂地撞在了官吏的手里，那么，作为惩罚，他的脑袋就要由刽子手砍掉。虽然许多年来这条法令根本没有得到执行，但至今